

苏联东欧局势变化与日美关系

王 持 明

80年代末，苏联、东欧局势的剧烈变化，是本世纪世界局势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给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带来的巨大震荡，给世界主要战略力量对比及其相互关系造成的巨大冲击，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它导致东西方冷战走向结束，美苏关系由缓和、对话走向谅解、合作，裁军进程获得新的推动力，在欧洲紧张对峙了几十年的两大军事集团正在发生质的变化，维持了40多年的欧洲“雅尔塔格局”迅即趋于解体，德国统一问题迅速实现。尽管这场“政治地震”的中心在欧洲，但它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亚洲太平洋地区，也必然给日美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

本文试图分析苏联、东欧的这种变化给日美关系带来的影响，日本和美国将如何对待日美关系中的这种新情况，以及90年代日美关系的发展前景。

(一)

苏联、东欧的变化及其对整个国际局势的影响，给日美关系注入了新的因素。

首先，日本在美国对苏政策中的战略价值有所下降，日美战略同盟的基础发生动摇。日美之间的战略同盟是战后初期东西方冷战局面的产物，其本身就是所谓“冷战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美国为遏制苏联，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之一便是联盟战略，与大西洋彼岸的西欧以及与太平洋彼岸的日本结成的战略联盟，是美国对苏遏制战略的两个轮子。《日本经济新闻》1989年12月5日的社论指出：“正因为有了冷战，日本才有了地缘政治上的价值”，因此，“战后的冷战结构对日本来说决非坏事”。几十年来的日美同盟正是建立在对苏遏制战略的基础之上的。在美国的全球战略特别是对苏战略中，日本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日本也从中获益匪浅。然而，由于苏联、东欧局势的演变，美苏关系由缓和走向合作，东西欧迅速接近，苏美之间的军事对抗水平大幅度降低，以及1989年12月美苏首脑马耳他会晤宣布“冷战走向结束”，这对日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冲击。日本舆论指出，既然对美国来说，苏联已不再是真正的威胁，那么，日美安保体制将不再是共同防苏体制，日美安全条约恐怕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日本各界纷纷惊呼，对日本来说，美苏和解的“背后隐藏着令人恐怖的因素”，对日本“是一种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沉重压力”^①。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对被视作“美国象征”的洛克菲勒中心、哥伦比亚影业公司等收买活动，刺伤了美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加剧了一般美国公众中已存在的反日情绪。美国人认为，既然日本能花大钱收买美国企业，为什么不能在防务上多花点钱来保卫自己呢？！美国“不能永远保护那些拒绝保护自己的富国”^②。因而使日本朝野都担心，美国将废除日美安全条约，抛弃日本，使日沦为“世界孤儿”^③。可见，日本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已达到空前程度。

①〔日〕《选择》月刊1989年10月号。

②〔美〕《国民利益》杂志1990年春季号。

③〔日〕《朝日新闻》1989年12月5日。

其次，为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条件，日美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的竞争加剧。由于苏联、东欧事态的发展，吸引了美国、西欧的主要注意力，尤其是西欧把越来越多的资金用来支持东欧的变革，使它们在亚洲的影响力日渐削弱，一些亚太国家和地区随之将目光更多地转向日本。加之美国自身的经济问题和政策措施，使亚洲国家已不象过去那样依赖美国市场而部分地被日本市场所取代。日本趁美欧无暇东顾之机加紧在亚太地区增加援助，扩大投资，已成为亚太国家资金的主要来源。日本在亚洲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正在日益增长，以至美国舆论警告说：“日本正在该地区发挥支配性作用”^①。尽管这种说法有点夸大其词，但由于美国要求日本“分担责任”，苏联渴望得到日本的资金和技术以支持其国内改革和开发远东地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期望与日本扩大经济、技术交流，使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日渐增强，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认为亚太地区已形成中、美、苏、日四极格局的看法并非没有根据。然而，在亚太地区具有巨大经济和战略利益的美国，决不会甘心让日本轻而易举地排挤自己的势力，同时，亚洲许多国家也指望美国能成为在经济领域抗衡日本、在军事安全方面抑制日本的力量。因此日美争夺亚太经济主导权和政治影响力的矛盾明显上升。

再次，进一步激化日美经济摩擦，使本来已经“白热化”的经济矛盾火上加油。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由于苏联、东欧的演变，日本的经济威胁已超过苏联的军事威胁。美国国会的反日情绪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不能说与整个国际局势尤其是苏联、东欧局势的演变无关。日本三菱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高桥和日本国际关系论坛负责人伊藤就曾指出：“在冷战还存在的条件下，美国不去注意日本这个令人讨厌的经济动物”，但随着苏联、东欧局势的演变，日本正在渐渐“失去它作为自由世界边界捍卫者的重要意义”，这样一来，西方世界就“不太能容忍”日本经济的继续扩张了^②。1989年以来，美国一再对日挥舞“制裁大棒”，运用“超级301条款”压日本全面改革经济体制和进一步开放市场，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最后，刺激日本加快走向世界政治大国、谋求与美国平等地位的欲望。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其国民生产总值已仅次于美国，而人均则已超过美国，登上世界最大债权国宝座已经4年，外汇储备居世界之首，去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援助大国，其经济实力不可谓不强大。然而，它在近年来的世局动荡变化中，在东西方关系、欧洲局势的演变以及推动军备控制和裁军进程等世界重大问题上的发言权有限，尝不到参与世界决策的滋味，日本对此愤愤不平。加之东西欧迅速接近，西欧的地位显著上升，一个统一强大的德国也必将在欧洲乃至世界事务中增强其份量。日本舆论一再强调，目前世界已进入美、苏、德、日“四强时代”，表露了日本不甘屈居西欧和德国之下的意向。此外，在日本看来，当今国际关系中军事因素逐渐下降，而经济科技因素上升，这正好给日本提供了“用武之机”，可运用其经济、科技优势发挥全球作用，随着苏联、东欧局势演变而引起国际秩序的新旧交替，也是其充当“乱世英雄”的机会，要抓住机遇，冲向政治大国的终点，力争与美平起平坐。海部首相在1990年2月其第二届内阁的施政演说中毫不掩饰地表明了这种欲望。他说：在“依靠实力的对抗支配世界秩序的情况下”感到“无能为力”的日本，在“政治的时代”，即在“开始通过对话的协调建立新的和平共处的世界结构的今天”，必须“有效地利用经济力，科技力和经验，积极地参与筹划”，发挥积极的全球性作用^③。紧接着在3月初与美国总统布什的会谈中又提出

①〔美〕《商业日报》1990年3月7日。

②〔美〕《华盛顿邮报》1989年9月17日。

③〔日〕《东京新闻》1990年2月3日。

了与美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的问题。

总之，在苏联、东欧变局的背景下，日美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日本对美独立倾向增强，美国对日警惕戒心加深。因此，尽管在目前相互需求和协调仍占主导地位，但竞争和矛盾的因素趋于上升，双方都在筹划并采取了某些对应措施。

(二)

针对变化着的国际局势给日美关系带来的影响，日本试图从调整日美双边关系和通过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积极贡献、发挥世界性作用两方面来加强其在对美关系中的地位。

日本力图通过为美国“分担责任”，同时在经济上也作出一定让步，来缓解两国之间的经济摩擦，以维系日趋恶化的双边关系。这是日本以“政治解决”来换取美国减少经济上对日压力的老路子。不过1989年下半年以来，分担责任的“政治姿态”比过去更高，表示要以“西方一员”的立场积极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在世界性和地区性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更加紧密的联合行动，成为美国的“全球性伙伴”。这样既可换取美国在经济问题上某种程度的谅解，又可抬高自己的身价，扩大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经济让步也大大超过以往为解决具体贸易纠纷而作出的努力。尽管日本许多人对美国施压于日本的做法深为不满，以至有众议员石原慎太郎著书发出停止向美国供应五角大楼所必须的尖端技术、“让美国臣服”的怒吼，甚至以轻蔑、辱骂的语言称美国在保护日本时表现得“与其说是看门狗，倒不如说更象是疯狗”^①，但毕竟在目前情况下，日本在经济上还离不开美国，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也还不能没有美国的支持和保护。因此，1990年3月份海部首相与布什总统会谈时表示，要把日美结构协商作为新内阁的最重要课题，一个月后两国就此达成协议，日方作出空前让步，使日美经济摩擦暂告缓解。当然，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今后仍将时起时伏。

日本还企图通过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做出积极贡献，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以增强对美关系中的地位。其主要做法有：

一是继续奉美国为盟主，但强调日美应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对有关世界性和地区性的共同任务与美密切合作，联合行动、分担责任，力图以日美为核心来构筑冷战结构解体后的国际新秩序，并联合欧洲，协调日美欧体制，形成由日美欧三家主宰的世界秩序。这样，日本便可在实际上成为西方“二号盟主”。

二是加强与西欧的关系，调整历来向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方式。本来在日美欧三角关系中，日欧关系是薄弱环节。为改变这种状况，1990年初海部首相访问欧洲各国，发表“新欧洲政策”，表明要加强日欧之间的政治合作，允诺西欧的要求，为东欧提供更多援助。其实，这后面一条，没有西欧的要求，日本也是要做的。因为在日本看来，东欧的变革会对21世纪的世界秩序产生影响，所以理应积极支持、增加援助。海部在访问波、匈时，答应在今后3年内向两国提供19.5亿美元的官方信贷及其它项目的合作和交流，这明显“具有政治性质”。日本的意图是要积极参与欧洲事务，参与“欧洲新秩序的建立”，为此，1990年还将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北约安全政策讨论会和欧安会关于欧洲新安全体系的会议，以提高其在欧洲和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利用欧洲各国之间、尤其是欧美之间的矛盾，既为防止美欧联合起来“整”日本“种牛痘”，也为有朝一日联合欧洲“抗”美国“育种”。前不久，日本的三菱集团与西德的奔驰集团在航空航天这个战略性领域的高技术合作，已在国际上，尤

^①法新社1990年1月18日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其是美国企业界引起强烈反响。这一表面看来似是民间企业界的经济活动，据日本报刊透露，实际上是有官方政治背景的，“是为了防备处在缓和时代的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可能会出现不稳而采取的措施”^①。

三是竭力构筑“亚洲特区”，蚕食美国“地盘”。日本要努力把东西方关系结构性变化扩展到亚太地区，力图为稳定亚太地区局势并引导亚太国家纳入西方社会体系作贡献。因此，近年来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主动外交”行动特别活跃。积极插手印支地区事务，安排在东京举行柬埔寨和平问题会谈，中山外相认为，这是“经济大国日本第一次登上正式发挥政治作用的舞台”。力促越党总书记尽早访日。筹划柬埔寨问题解决后帮助印支三国重建经济，为稳定、缓和朝鲜半岛局势多方周旋，力图先于欧美国家放宽对中国的“制裁”，对蒙古提供经济援助，并给予贸易最惠国待遇；试图调整长期坚持的对苏“政经不可分”原则，探索日苏关系的改善，力图取得“突破性进展”。日本的这些举措，既配合了美国要把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和市场经济原则推广到全世界的全球政治战略，以博得美国的“欢心”，又发挥了亚太政治秩序方面的“主导作用”，并逐步“填补”冷战结构解体过程中出现的“真空”，甚至蚕食美国的“地盘”。例如海部出访南亚诸国，给印、巴、孟等国带去2000亿日元援助贷款，表示要在那里发挥经济和政治作用；许诺在1990年度内给印尼17亿美元协助其“经济起飞”，并重申不改变对东盟“优先照顾”的方针；邀请南朝鲜总统卢泰愚访日，建立“日韩关系新时代”等做法更突出地含有上述意图，企望在建立“国际新秩序”过程中逐步构筑起日本的“亚洲特区”。但这也不能不引起美国的疑虑和戒心。

(三)

美国方面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应付这种新的形势。其做法基本上是“敲打”和“安抚”两手并用，外加某些外交牵制，以控制日美关系的恶化和日本国内日益抬头的民族主义倾向，使其不致走得太远。

“敲打”政策，即针对日本由于急剧动荡的国际形势和凭恃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而在国内显著增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从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不时地“敲打”日本，施加压力，以抑制美国认为日本“越来越武断”的倾向。

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刀，是美国“敲打”日本最突出的做法之一。日美间的经济摩擦由来已久，为什么1989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变得特别严厉强硬，不仅仅要求降低贸易差额，还逼日本“全面改革”国内经济体制？用美国芝加哥坎珀金融服务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黑尔的话来说，这是“东欧解放所带来的具有讽刺意味和始料不及的后果之一”，过去“美国之所以能容忍对日贸易中的巨额逆差”，原因之一是“日本能在西太平洋起到美国的航空母舰的作用”，而目前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②。在美国看来，日本正利用动荡的局势“坐盼渔利”，不仅要在亚太地区与美争夺经济主导权，而且要“领导世界经济”。因此，美不时挥舞“超级301条款”压日开放市场，而且不怕说它干涉内政提出改革日本国内经济体制的具体要求，用日本《选择》月刊的话说是彻底的“改造日本方案”。这是战后结束对日占领状态以来绝无仅有的做法。

①〔日〕《选择》月刊1990年4月号。

②《人民日报》1990年5月24日。

③〔美〕《国际先驱论坛报》1990年1月2日。

在政治上压日本“低头”，要日本只能说“是”而不许说“不”。虽然这只是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为布什提供的背景材料中的主张，但在实际上布什政府也正是实行的这种方针。1990年初，美国对日美经济结构协商进展缓慢感到不满。为此，美趁日本大选刚结束，第二届海部内阁尚未诞生之机，由布什总统亲自从大洋彼岸拨通电话邀请正在忙于组阁的海部“紧急访美”。此举正是布什“非逼日本政府就范不可”的一种策略。日本舆论认为，美国在日美经济协商中持如此强硬态度的“真正目的是使日本变得软弱”^①。

在军事领域，改变过去要求日本增强防卫力量的做法，转而采取抑制日本军事大国化的态度。一是由国防部长切尼亲自提出要求日方100%地承担以日元结算的驻日美军费用；二是在武器技术问题上提出要同日本进行双向交流，减少五角大楼对日尖端技术的依赖，并阻止日本单独开发不能与美国武器相互补充的武器系统；三是提出抑制日本提高“投入战力的能力”，美国防部的官员明白表示，美“不希望看到日本航空母舰在印度洋游弋”。美国防部1990年4月向国会提出的“东亚战略设想”中进一步表明，要阻止日本的防卫力量整备摆脱美国，劝说日本放弃其军事野心。日本舆论界认为，这表明驻日美军的性质已开始发生变化，即由过去“保卫日本”转变为“监视日本”^②。

可见，对日本的“敲打”政策，是美国在新形势下针对日美关系中的新问题，基于长远考虑而采取的含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如果说，这种“敲打”政策还基本上只是就日美双边关系范围内的事，那么，“安抚”政策就不然了。

“安抚”政策，即利用日本的政治“大国欲”和对世界事务的“参与欲”与日本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准备以某种平等方式赋予日本以政治、经济政策的责任，从而也赋予它以权力，扩大它在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具体做法有：

一是主张提高日本在多边国际机构中的地位。例如建议让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支持由一位日本人在今后二、三年内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领导职务等。

二是在全球范围协调外交政策。要求日本在东西方关系、稳定地区局势等问题上进行全面合作，在消除债务危机、协调发展政策、打击国际恐怖活动和毒品交易以及保护自然环境等方面采取联合行动等，使日本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和发挥全球性作用。

三是鼓励日本参与欧洲事务。如支持日本参加北约和欧安会的会议；欢迎日本参加援助东欧变革的国际财团等。当1990年初日本首相访问波、匈，宣布今后3年内提供19.5亿美元的经援后，布什总统当即赞赏说，“日本发挥了世界领导作用”。

四是扩大美日欧三方对话。美日两国外长已开始探索举行三方会谈的方式。用布什的话来说，其目的之一就是“考虑日本怎样才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机构中比较充分地发挥主导作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伯格斯藤甚至还提议建立美日欧三方世界经济指导委员会，认为让日本参加这个委员会将使东京成为更好的伙伴^③。

这种“安抚”政策，既可减轻日本因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而引起的“孤立感”、“危机感”，又可使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对世界事务的参与欲，“体验发挥战略影响的味道”^④，提高其国际政治地位的要求；既可使日本在国际事务中为美国分担部分责任，又可

①〔日〕《选择》月刊1990年4月号。

②时事社1990年4月18日发自华盛顿的述评。

③〔美〕《华盛顿邮报》1990年5月6日。

④〔香港〕《远东经济评论》1989年12月21日。

将日本更牢地拴在西方联盟体制中，放在可监督的视野之内，避免其脱离美国单干，还可以使美国在美日欧三角关系中居于有利地位，某些时候可联合欧洲逼日妥协，必要时则可利用日本的力量来牵制欧洲因在新形势下国际地位有所上升而“独断专行”的倾向。

此外，美国对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主动外交”行动也采取了不少牵制行动。例如，对日本欲改善对华关系的动向多方阻挠；在海部出访南亚后，紧接着派遣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的副手和副国务卿去南亚活动；日本邀请蒙古总理访日，美迅即表示准备给蒙最惠国待遇；在印支问题上美突然采取180度政策大转变，使刚主持举行了柬埔寨和平会谈的日本进退维谷。尽管它们在这些问题上有着某种共同的语言和利益，但无可否认，它们也有着各自的企图和盘算。

(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苏联、东欧局势急剧变化引起整个国际格局动荡的大背景下，日美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可以认为，两国的关系已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围。就日本方面来说，其对美政策含有“正面（双边关系）防御、侧翼（全球范围）进攻”的性质；而美国方面对日本的“正面攻势”，就其本质来说也还是“以攻为守”，只是应付日本的挑战而已。

因此，可以认为，在90年代日美关系将呈现如下趋势：

1. 日美同盟中日本的位置将进一步增强，同盟的军事因素趋于淡化，甚至有可能向政治联盟转化。因为东西方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军事对抗因素下降的趋势必将扩展到亚太地区。另一方面，也是美国抑制日本军事大国化的需要。日本前首相中曾根也认为，随着目前形势的发展，有必要修改日美安全条约。

2. 日美之间的经济摩擦仍将时起时伏，日趋激化，两国将从争夺亚太经济主导权逐渐向争夺世界经济主导权扩展。其实质是争夺经济霸权，据预测，到本世纪末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占全世界的20%，只比美国低15%，届时日本在亚太的经济影响将超过美国而居优势，并向全球扩展。但在“缓和红利”刺激下，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将有所增强。因而两国的经济竞争，尤其在亚太地区将更加激烈。但另一方面，面对一体化的欧洲，在日美欧三角关系中，日美有共同对付“欧洲堡垒”的相互需要，因而两国的竞争仍将是可控制的。

3. 日美之间将萌生争夺世界霸权的因素。由于美苏两国影响国际事务能力的下降，尤其是苏联很可能难以保持超级大国地位，而日本的国际地位却在稳步上升，其野心也随之膨胀；另一方面，美国对日本的“敲打”政策很可能引起“反弹”，更刺激日本增强对世界事务影响的欲望。日本的国际政治学家舛添要一在1990年1月号《宝石》月刊上发表文章，鼓吹“输出日本文化”称霸世界。他认为谋求世界霸权必须拥有经济、金融、军事和文化四方面的优势，而日本在经济、金融两方面已经俱备，“只要日本愿意，谋求军事优势也不困难”，因而关键是“文化”，要在世界范围内树立起令人羡慕的“日本哲学”。有事实表明，这并非只是他个人的主张。1990年4月，经团联筹建了基本资产为300亿日元的新财团，其任务就是向国外派遣国际开发协作人才和推进国际文化交流，弘扬日本文化。而在政府方面，早在中曾根执政后期就打出了“文化输出外交”的旗号，并花巨资建立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可见日本的意图是明确的。有鉴于此，在亚太地区，日美矛盾超过日苏矛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苏联、印度、东盟等重要力量都将成为美日两国争取的对象，尤其是对苏联，不排除在亚太地区美苏联手对付日本的可能性。（1990年8月稿）

〔责任编辑 刘庆芳〕